

何炳棣教授与《明清社会史论》

徐泓

何先生的《明清社会史论》，自 1962 年出版至今虽已半个世纪，但无论论题的开创，运用史料与统计分析方法的精到，获致结论的坚实，都是其他相关著作不可伦比的。《明清社会史论》可说是一本中国史研究、社会史研究与东亚史研究及社会科学界誉为之划时代经典巨著。尤其在科举与传统中国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史上，其地位迄今仍是屹立不动的。

何炳棣院士于 2012 年 6 月 7 日清晨 7 点 11 分在睡梦中安然去世，享寿 95 岁，从此史学界失去一位跨世纪的大师。何炳棣先生原来念的是英国史，后来转治中国史；他的研究领域很广，包括扬州盐商与商业资本、明清至民国的人口、明清会馆、明清科举与社会流动、美洲新大陆作物输入中国、北魏洛阳城的规划、明代土地数据、清代在中国史上的重要性、黄土与中国农业文化的起源和他近年研究的先秦诸子等。何先生收集史料之辛勤，运用史料之精妙，方法与史识之独创，轰动史林，惊动万教(教育界)，当今华人治史罕有能出其右者。

何先生不满于中国文史研究被洋人归类为“汉学”(Sinology)，因为“汉学”是西方人“东方主义”(Orientalism)及其“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的产物，他们鄙视汉学，不置之于西方为主流的学术殿堂正殿。因此，他治中国史都选重要的大问题，成果都由重量级的西方大学出版社和学术期刊出版，要和西方史家进行对话。何先生的学术受到西方学界的肯定，1965 年芝加哥大学聘为地位崇高的汤普逊(James West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并于 1975 年当选美国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首位亚裔会长。

何先生擅长于广泛运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长处。何先生的巨著《东方的摇篮：纪元前 5000 年至 1000 年华夏技术及理念本土起源的探索》(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 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 B.C.)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以考古资料及古动植学与文献训诂互证，论证中国古代文明源于本土，打破西方学者的世界文明源自西亚的一源说；连撰写《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 with a Retrospective Essay)，以强力主张这种说法

著称的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教授也为之折服。向来不服人的李敖读完这本书后，也大为赞叹说：深觉其体大思精，乃真正“大历史”，其他同类中外名著，在这本巨著面前，“亦灰头土脸矣，佩服之至！佩服之至！”

何先生为人率真，不假颜色，很多人怕他。他成长于对日抗战之中，有浓厚的民族意识，虽因工作关系入美国籍，但热爱中国之心过于常人，曾质问一些华人学者：你是中国人怎么可以不爱国？何先生 1979 年底，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中美建交举办的讨论中美关系的会上发言，面对满场洋人学者，他独排众议，揭发研究中国的洋人

学者的反华情结。何先生敢言直言的态度在西方学界的华人学者中极为少见，一般华人学者在洋人屋檐下总是低头，何先生决不示弱。十多年前面对“新清史”学者的代表罗友枝(Evelyn S. Rawski)教授发表《再观清代：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否定汉人与汉文化对清朝国祚之作用，何先生像巨砲一样地雄辩反击。何先生说：罗友枝曲解他的论点。他认为，满族之所以能有效地统治人口最

(下转 7 版) ➡

← (上接 5 版)

估计失之过低，但在最近的研究中，已根据浙江传统耕地面积的膨胀因素相当大的特殊情况对此作了修正。作者指出：这并不是说卜凯和《统计月报》对所有省份耕地面积的估计都一律失之过低。例如浙江的传统土地数字已经证明失之过高。卜凯和《统计月报》虽对一些浙江县份的耕地做了修正，但所估全省耕地仍是 41,209,000 市亩，即使折成 38,000,000 解放后的市亩，也还是不合理地高过 1979 年呈报的耕地面积 27,433,000 市亩。详见《南宋至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下)》(《中国社会科学》1985 年第 3 期)。

责编杜非要我向何先生要一张他满意的照片，提供一份作者简介。但看到他自撰的简介后，我与杜非都不敢采用，因为他用了很多最高等级的形容词和定语，刊登出来有损他的清誉，删去又怕引起他不悦。最后商定，照片不用，将原定整页的作者简介改为在封面勒口放

作者简介与译者简介，这样用不了几句话。新书寄去后，我一直担心何先生会兴师问罪，但他始终未提及简介被大大简化的事。三联版出版后，未再听到何先生对译文的批评。晚年他授权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全集时，此书仍用我的译本，并未再坚持改动译文，显然已接受了我的做法。

何先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初曾全力投入“保钓(鱼岛)”运动。“文革”后期他是最早访华的旅美学者之一。1966 年他当选为台湾“中研院”院士，后来他主动断绝了联系，二十余年不参加活动。后来他给我的信上说，已决定恢复与“中研院”关系，后来听说是李中清调停的结果。后来我去“中研院”访问，台湾的朋友谈及何先生出席院士大会的情况。杜维明落选后，有人问何先生是否他投的反对票，何先生得意地说：“哪还轮得到我出手，前面早把他干掉了。”

晚年的何先生性情依旧，谈话中几乎没有不骂人的。对多数人他只是学术、学问上



1979 年 4 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单独接见何炳棣先生。 均资料照片

批评，有几位却涉及人品，他会说“这个人很坏”，“某人很阴险”，“对某人要小心。”

他在鄂宛二次退休后，全力研究思想史。他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学问，但没有毕生的积累不行。他发表了一篇从思想史角度研究《红楼梦》的论文，告诉我：“这可是一篇重要论文，其他人是写不出来的。”我不懂《红楼梦》，知道魏同贤先生是红学

专家，就问他是否看过何先生的论文。魏先生说：“果然不同凡响，红学界的人很佩服。”

杨振宁先生请他去香港作讲座，他很满意，以后又应邀去清华作讲座。在上海他与我谈及香港之行，他说：“现在我与杨振宁越来越有共同语言。一个人过于谦虚绝对是虚伪，对有些人就是应该瞧不起。”

他最后一次来上海是应华东师大之邀，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听他的教诲，多数时间是讲思想史的重要性，讲墨子的地位应大大提高。以后在报道中得知他在清华的讲座就是讲墨子，可惜我没有能赴京受教，并且再也没有聆听的机会。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